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黄俊杰 主编

郑吉雄 编

东亚视域中的 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黄俊杰 主编

郑吉雄 编

东亚视域中的 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郑吉雄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17 - 5878 - 6

I. 东… II. 郑… III. 儒家—研究—东亚 IV. B222. 05
B3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159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 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128 号

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

编 者 郑吉雄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李雪芝
责任校对 王 卫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2
印 张 21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878-6/B·392
定 价 3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社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於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黃俊傑 謹識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序

郑吉雄*

2002年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成立,我奉黄俊杰老师之命,承乏东亚文献研究室的策画工作,开始推动一连串儒学文献与思想的研究,其中包括举办主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及小型的学术讲论会。本书所收录的论文,主要是从东亚文献研究室2003年10月“东亚儒学文献(清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04年5月“中国台湾地区、日、韩东亚文献资源与研究主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中,择优编辑而成。其中因为议题相近,经过征询,亦收录了徐兴庆兄于2003年6月中心举办的“东亚、儒学与东亚儒学学术研讨会”中发表的关于朱舜水研究的论文。周启荣兄的论文,则是以2004年7月15日他在中心第21次学术讲论会上的讲稿为基础,缀玉成章。

书名题为《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各篇涉及了中、日、韩近世儒学课题,撰著人则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①、中国香港^②、中国台湾^③、韩国^④、日本^⑤和美国^⑥的学者。从东亚的视域看,本书涵括的议题较丰富,而因为邀请对象分布较广,反映的观点也较多元。但全书的主题,还是集中在

*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① 陈祖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彭林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刘智鹏(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③ 笔者之外,还有王基伦(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徐兴庆(台湾大学日本语文学系教授)和詹海云(元智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

④ 李光虎(韩国延世大学哲学系教授)、孙叡彻(韩国汉阳大学中语中文学科教授)、崔一凡(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东洋学部教授)。

⑤ 水上雅晴(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助手)。

⑥ 伍安祖(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周启荣(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兼 Spurlock 博物馆馆长)。

近世儒学文献与儒学思想的关系上。作为主编,我除了把伍安祖兄和周启荣兄的论文翻译为中文外,也对于全书各篇论文作了一些细微而必要的修正,主要是基于统一全书体例的需要,少部分则是将日、韩学者若干较特殊的词汇,改换成汉语一般的用法。我的原则,是尽量保留原文辞句的语气和意旨,使不受影响。

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已成立两年多。能够在短短两年之间邀请到那么多学术界的同道,在一个不算太大的研究范围中共同撰文论辩,诚为难能之事。每位撰著者文笔各具风格,思辩各擅胜场,论旨固无万殊之异,议论亦不必归于一途。在人生逆旅中,我能有如许机缘,与诸良友相与谈学论道,深感庆幸。我谨以八年前所撰的旧诗一首,附录于篇末,一以志两年来的学术因缘,一以酬良友深厚的支持之情。诗云:

执手凭高会,析言异轂音。不随人俯仰,难与俗浮沈。

缣采辞称贵,缘情味始深。论文千载下,慎莫弃初心。

2005年3月9日序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导 言

郑吉雄*

儒学在东亚文明演进历程中的重要性,在近数十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东亚学者的研究下,已显得愈来愈清楚,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近年来笔者与黄俊杰老师以及几位学术界同仁共同执行“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并创立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以“东亚儒学”为中心两大研究方向之一,也是基于此一信念。

从理论的层次考察,儒学中以“人”的德性为主体的价值体系,的确足以与世界其他诸文明、诸宗教的核心价值体系,共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价值的参照指标。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新儒家学者努力从传统儒学中特别细绎出具宗教意义的成分,运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和语汇进行新诠,取得很多有意思的研究成果。这对儒学的研究而言,的确是有贡献的。

然而,我们若透视东亚儒学的全部内容,其中纵使有若干成分和“宗教”可以互喻,究其大端要旨,则儒学与宗教始终异趋。儒家思想是随着历史文化与文明进程的发展,渐次建立并趋于完密的。它的发扬,孔、孟、程、朱等圣哲固然功不可没。但正如章学诚(实斋,1738—1801)所说,“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文史通义·原道》),孔孟学说中属于人类普遍性价值的部分,必然是奠基于最深层的人文文化,是从最广大的平民生活经验中领悟到的人生智慧。孔孟思想当然也不可能与他们以前,千百年间的中国人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悖离。儒学许多最重要的价值内容,既借由人类群

*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体生活价值取向的同条共贯来呈现,伦理中的礼俗仪轨,便成为它主要的寄托所在。儒家礼教产生自人类社群生活的集体自觉,其思想价值也终应落实于社群生活之中。换言之,历代伟大的儒者,固然抉发了许多重要的儒学观念,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作出了贡献。但从另一个层次看,在历史的长河里,儒家思想的许多不变的价值,即使没有儒者探研,其实也一直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未尝凋零。相对而言,儒家许多因无法随历史转化而逐渐消亡的观念,即使有再多的哲人提倡,也很难有续命之机。换言之,像儒家所倡君臣夫妇纲纪之说,即使今天再有大儒提倡,恐亦难以为继。反过来说,任何人都有权利宣称不接受儒学,却不可能去反对儒者所最信奉的、产生自伦理生活的诸如仁爱、孝顺、诚实等伦理价值,以及长幼、养老、扶弱等道德行为。这些价值与行为,在东亚地区如何被历代儒者诠释,如何在历史脉络中转变,都一一在经典载籍里留下了痕迹。这是笔者认为,探讨儒学不能不植根于文献研究,而在本书主题上特别强调“文献”与“思想”的主因之一。

随着两千余年历史的演变,跨越了东西各国之间万里之遥,儒学对于东亚地区人民生活价值的主导力和影响力,始终历久弥新,而成为东亚精神文明最普遍的基础。落实在东亚的历史传统,儒学的信仰也往往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的文化脉络而有不同的论述与显现。儒学生命的生生不息,也在此处获得了坚实的证明。宋明理学家吸收了汉儒象数理念和佛教、道教的若干思想观念,而建构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乾嘉经儒实践《易》自强不息之旨,以“学隐”(章太炎《诂书》)的姿态,阐发“完密之至,故无所苟之至;无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龚自珍《定盦文集·抱小》)的考据精神;朝鲜儒哲吸收宋儒的理学观念以及图象诠释方法,阐释心性义理,创造大量儒学图象文献;日本古学派儒者推崇古文献与礼教,与中国17世纪以降经世致用一系的思想遥相激荡。借用佛教的譬喻,儒家思想有诸般面相,千变万化,“如帝释殿,天珠网覆,珠既明彻,互相影现;所现之影,还能现影,如是重重,不可穷尽”(《华严经旨归·显经义第七》),东亚儒学随着时空的转动,透露出千变万化的瑰丽光彩。这些累积了两千余年的光彩,一一烙印在文献

之中。这是笔者认为,探讨儒学不能不植根于文献研究,而在主题上特强调“文献”与“思想”的主因之二。

儒学文献植根于东亚这片土壤,直至16世纪,才逐渐被传教士携至欧洲翻译流传^①。含有浓厚儒学色彩的东亚文明,明显有别于欧洲、美洲及中亚细亚思想文明的特色。近年来东亚地区文献研究风气十分蓬勃,搜编和研究成果也极为丰硕,但学术界关于东亚儒学和当代儒学的研究,明显地朝向哲理分析的方向倾斜,并未真正全面地从东亚文献中汲取资源。“东亚儒学”和“东亚文献学”一旦各自分途,两个领域的优势便无从互相沟通支援。然而,在从事具体研究时,这种互相沟通又是必需的。例如近30年来出土的简帛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子思及战国儒家关于性、情、内、外等重要观念的文献,涉及孔子(551B. C. —479B. C.)以后,先秦儒家思想的特性与转变问题。而由于子思、孟子(372B. C. —289B. C.)的思想常被认为是宋明儒陆九渊(象山,1139—1192)、王守仁(阳明,1472—1528)的思想源头,因此这些简帛文献也涉及了儒学史的源流问题。倘若研究者不具备文献学的知识,透过掌握《礼记》诸篇的语文内容与编集年代,与《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等出土篇章作比较,并且参用王国维(观堂、静安,1877—1927)二重证据法的准则,进行文献解析,则恐怕连解读新出土文献的第一步都无法踏出,更遑论分判思想源流了。这正是哲理分析与文献分析相须互用、彼此支援的最佳例证。自去年起,笔者推动“出土文献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就是希望对这项重要的学术事业略尽绵力。由此可见,东亚儒学和东亚文献学,虽然各具范畴,各有成就,但唯有以整合的观念,加强两个领域知识的交流,才能提升既有的研究,并开发新的课题。这是笔者在主题上特别强调“文献”与“思想”的主因之三。

① 最早被欧洲学者翻译的中国儒家经典,可能是耶稣会士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拉丁文翻译的《大学》,在1593年罗马出版。(此一文献被纳入 Antonio Possevino's *Bibliotheca selecta qua agitur de ratione studiorum*. 参 Knud Lundbeck, “The First European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Works,”收入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ed. Thomas H. Le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6.)

本书在“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的主题下，共设立“经学运动的思想视界”、“清儒的文献研究”、“中日儒学的交涉”、“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四个子题，收录了13篇论文。以下分别说明各子题所讨论的问题。

关于“经学运动的思想视界”方面收录论文4篇。刘智鹏和笔者的论文分别讨论了清初和清中叶两位反理学的健将费密（经虞，1625—1701）和戴震（东原，1723—1777）。刘智鹏《费密与清代经典诠释的论争》指出，费密处于明清之际，率先提倡运用训诂之法研究经典，达致经世致用的目标，以彻底否定宋明理学的内容和形式，为清代的汉宋之争写下了第一道论题。作者也检讨了费密过信经书和训诂的缺失，以及他将王学末流和整个宋明理学等同起来的偏差。笔者《戴震气论与汉儒元气论的歧异》则藉由分判戴震与汉儒“气论”的差异，说明东亚“气”思想的一个面相。戴震以抨击宋明理学为目标，将“气”概念规范在社群的范畴，引导出重视气质之性、血气心知的平等思想，把汉儒的气论从“天上”拉回“人间”。他对于汉儒最讲究的神秘主义、宇宙生成论等毫无兴趣，对于群体人民的形体生命是否受到维护和公平对待，则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清代儒学思想以“反理学”为主。这两篇论文掌握了反理学思潮的源起与思想属性问题，然而，关于“反理学”这个新典范的内涵问题，尤其是它和宋儒、汉儒思想的差异性，还有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伍安祖《抉发经典：作为本体宇宙呈现的文本意义》一文，则透过比较的角度，将欧洲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跟中国的乾嘉学术做一个对照，强调清代的考证学所注重的天人关系。作者也讨论了清代公羊学“微言大义”的思想，强调公羊学者透过经典文字来体认宇宙的真理，与西方诠释学重视知识论与方法论有很大的不同。《抉发经典》和《戴震气论》二文都提示了研究者在分析清儒考证学时，绝不能忽略文献以外的形上思维的部分。周启荣《明末清初的训诂学、文献考证与经籍研究》一文借由分析杨慎（用修、升庵，1488—1559）、焦竑（弱侯、澹园，1540—1620）、姚际恒（立方，1647—？）的经典研究，毅然截断了16至17世纪以语文训诂为主要取向的考证学与18世纪考证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清中叶的经典考证学能否上溯至明末？或者说明末至清中叶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清晰的思想史发展线索？

此自梁启超(任公,1873—1929)提出清学为宋明理学一大反动说以来,即为一颇具争议性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至少如刘智鹏的论文就承认这条线索的存在)。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明清思想转折提出过的理论,至少在15种以上。本文广引典籍,辨析入微,其论点是治清学者不能忽视的。

东亚儒者原本就有特别重视“文献之传”的传统,认为“文献”才是一切人文精神依托的基石。清儒对此尤为重视。本书“清儒的文献研究”部分,收录了詹海云、王基伦和彭林的三篇论文。詹海云《全祖望研究的一个侧面——谈全祖望诗文集整理的文献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清代学术现象》通过分析清初文献学大师全祖望(绍衣、谢山,1705—1755)及其朋友、学生的个性,疏解其卒后诗文刊刻争议所牵涉的学术史问题,既突显了祖望身前后与文献学的不解之缘,同时也提醒我们:一位大师巨子的学术成就是否得到完善的保存,是否能供后人正确的理解,都取决于文献整理者是否掌握到其著述的精神血脉。如此,则作为学术的后继者,我们焉得不以谦卑、恭谨的态度从事文献整理工作?东亚儒学传统的重“文”的思想,发展至18世纪,儒者又特别提出“条理”的观念:戴震用“分理”、“条理”释“理”字(《孟子字义疏证》“理”条),钱大昕用“治丝”、“有条不紊”释《六经》的“经”字(《潜研堂集·抱经楼记》),都视宇宙、人生、文化、经典,为一全体具有高度精密条理的结构。焦循(里堂,1763—1820)作为乾嘉最重要的经儒之一,文理密察更是他的核心价值。例如他治《易》所发明的“旁通、相错、时行”三例,就是奠基于六十四卦的内部架构之上,突显意义规律的条理性。而王基伦《焦循手批〈柳文〉的评点学意义探究》从评点学的角度,集中讨论焦循疏理唐代古文家柳宗元文的见解,包括作家论、渊源论、技巧论、风格论四方面,为焦循的文理思想做了很细密的疏释,也等于为焦循“学问之事,以属文为要。……大之能包括一切,细之能穷极毛发;繁简长缩,所不拘也”(《里堂家训》)一段话,做了最好的注脚。清儒文理密察的思想,当然也贯彻到经学研究和古史研究上。彭林《论清人的〈考工记〉研究——以〈轮人〉为例》一文就以清儒对于《考工记》的三条考证为例,论证了他们面对艰深的经典内容和简约的古

代注解时,能不矜意气,用谨慎精密的考证还原本义的学术精神。作者认为清人长于小学,尤擅于名物度数之学,其于《考工记》诠释之成就,则臻于颠峰。事实上,当代的学者之所以能研读先秦儒家及诸子百家的古籍,泰半仰赖清儒深细的考释。如果没有王念孙(怀祖、石臞,1744—1832)、孙诒让(仲容,1848—1908)等学者整理,许多古籍的内容几近无法理解。这就证明了贯彻清代两百余年的文献学和文理思想,对于当代东亚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有多重要了。

关于“中日儒学的交涉”方面,本书收录了水上雅晴《近藤重藏与清朝乾嘉期学者的校勘学》和徐兴庆《朱舜水对东亚儒学发展定位的再诠释》二文。水上雅晴试图以相当于中国嘉庆年间,担任红叶山文库管理者的近藤重藏(守重、胜重、正斋,1771—1829)为题,说明中国考证学东传,及其在日本被接受、发展的过程。近藤所编著的书籍和目录,对汉籍的分类,清楚反映出其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他也受林述斋(1768—1841)的影响,尝试采用从中国进口的图书或留存于日本的材料,解析相关问题。此证明日本学者除接受中国的考据学外,并能活用日本所保有的有效资料,发展日本的考证学。作者论证了日本在江户时代虽因采取锁国政策,限制了中日学者间直接的交流,但透过书籍的流通,在学术研究上亦取得相当丰硕的成就。这等于阐明了一个汉学藉由文献而成功流传域外的案例。至于徐兴庆所讨论的朱舜水(之瑜,1600—1682)的例子就较为复杂。17世纪中叶朱舜水以一位来自浙东的亡命儒者的身份东赴日本,秉持对朱子、阳明均有所批判的立场,其儒学思想已非纯粹的朱学或王学所能牢笼,而他又与明清之际复杂的政治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赴日后,要适应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独特政体,以及由武士阶层产生的价值观念,这都是大异于中国的新环境。舜水在江户及水户讲学,与当时日本朱子学、暗斋学和古学等几个不同的学派有来往,思想上与这些派别的学者有同有异。他竟能进入了当时日本思想界的核心,将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尤其是经世致用思想和忠义思想传于彼邦,辅弼德川光圀(1628—1700)刷新藩政,提振教育,建构了幕末日本思想界不可忽视的价值体系。综合而言,近藤重藏和朱舜水的案例都证明了

东亚地区儒学的流传,必须从中、日、韩各地的特殊背景和儒学主流价值两方面同时切入,才能观察全局。

本书关于“儒学在朝鲜的发展”共有四篇主旨不同的论文。李光虎《从〈圣学十图〉看退溪李滉的圣学观》从存在论和人性论两方面分析了李滉(退溪,1501—1570)《圣学十图》的结构,并探讨了退溪整个圣学观中包括圣学、心法和实践学问的方法等问题。作者为退溪的同宗后裔,运用带有朝鲜古文风格的文笔,重新诠释退溪的思想,在本书中显得别具特色。关于退溪《圣学十图》的图形结构,及其与其他朝鲜儒者所作的儒图彼此之间的异同,涉及了图象诠释的符号、方位、结构和方法等各方面问题,尚待研究者作出补充。学术界一般的理解,韩国儒学主要是传承朱子理学,各项议题也多围绕朱子学的理论而开展。这不能说不对,但若过度依恃此一观点,可能会让我们轻视忽略了韩国儒学其他不同的内容。幸而孙穀彻、崔一凡的论文分别从“点”与“面”两方面,提出了多元的观察。孙穀彻《丁若镛治〈大学〉的几个特点》以活跃于18、19世纪之际的大儒丁若镛(茶山,1762—1836)为例,指出若镛54岁开始撰写的《大学公议》,采用汉儒经说的立场,并参以古礼和实学的思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反对朱子《大学章句》的见解。其实,从若镛依《礼记·大学》原本,分为27节解说,将之看作叙述一贯的经文,而不采用朱子经一章、传十章的改本,即可见其立场。若镛深受西洋科技影响,又曾以精造工械得到正宗的赏识。他的经学立场多采汉学,《易》学尤精象数,和性理学者在路径上根本不同。崔一凡《〈东儒学案〉所见之韩国儒学的学派及其思想特征》则以疏析儒者河谦镇(1870—1946)于1938年编纂的《东儒学案》为主。作者针对河氏的学术思想立场进行解构,指出河氏在思想上属于性理学两大派之一的岭南学派,因此其著书立说,实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作者在分析《东儒学案》时也铺陈出朝鲜以“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为主轴,衍生出众多流派的繁复情况。其中如17世纪后期,朝鲜理学竟出现过批判朱子学的学风,也有如郑齐斗(霞谷,1649—1736)这样的阳明学集大成者。18世纪以降,则出现了如研究清代考证学的实事求是学派学者金正喜(1786—1856),以及集实学派大成的大儒丁若镛。这都是研究韩国

儒学的学者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儒者。

陈祖武《〈李朝实录〉所见乾嘉年间中朝两国之文献与学术》主要以《李朝实录》之记载为主,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了中、朝之间的文献交流,为本书“儒学在朝鲜的发展”一节划下了句号。作者首先指出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跨李氏朝鲜英宗、正宗和纯宗三朝,八十余年间,朝鲜通过每年数度派遣使臣,维系两国关系,购求中土典籍,进行学术交流,为儒学文献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甚多贡献。本文共分三节,既讨论了清朝对朝鲜儒学的积极影响,也指出了朝鲜儒学接纳了中国儒学后,所作出的独特发展。像正宗二十二年(1798)编定《四部手圈》,即系直接受中国纂辑《四库全书》影响。又如中、朝两国同尊朱子,清廷以朱子为门面,实质倡导经史考证。相对而言,朝鲜英宗、正宗、纯宗三朝则大量辑印朱子书,全面表彰朱子学,使朱子思想大盛。作者清晰地描绘出一幅东亚儒学传播的图象:儒学溯源于中国,而传播至域外之时,接受的国家亦必依照其风土、文化以及历史环境,以不同的方式受纳,作出各不相同的演变,产生新的理解与发展。东亚儒学内部枝分叶派,有同有异,各有丰采,其深具研究价值,亦在于此。

本书13篇论文,讨论了中、日、韩三地的儒学,涉及版本目录学、思想史、经学、儒学史、经典诠释学等几个重要的领域。各篇论文共同突显了东亚儒学的主体精神,也展现了东亚各国儒学研究各不相同的议题的内涵。我在上文借用了《华严经》“珠既明彻,互相影现”来形容东亚儒学之“珠”的瑰丽多变,本书各篇论文,就是最佳的证明。当然,学术研究的路没有止境,未来必然还会有更多的研究者,扎实地在浩瀚的东亚文献基础上,作出更丰富、更多姿多采的成果。作为这个学术之塔的攀登者,我也深心盼望这一天能早日来临。

2005年3月21日识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目 录

序 郑吉雄 1

导言 郑吉雄 3

经学运动的思想视界

费密与清代经典诠释的论争 刘智鹏 3

 一、前言 3

 二、清代学术的先行者 4

 三、费密的汉学背景 5

 四、费密推崇汉唐经学的理据 7

 五、开启清代经典诠释的论争 11

 六、余论：对费密汉学主张的检讨 15

戴震气论与汉儒元气论的歧异 郑吉雄 19

 一、阴阳消息之气与血气心知之气：歧异之一 21

 二、尊卑意识与平等思想：歧异之二 33

 三、宇宙生成论与社群意识：歧异之三 41

 四、结论 49

抉发经典:作为本体宇宙呈现的

文本意义	伍安祖著,郑吉雄、张晴翔译	51
一、Grafton 关于欧洲经典史论的启迪		51
二、清代考证学的本体诠释背景		54
三、庄存与《春秋》诠释中的本体宇宙论		56
四、刘逢禄经典诠释中的本体宇宙论		61
五、结论		65

明末清初的训诂学、文献考证与

经籍研究	周启荣著,郑吉雄译	66
一、前言		66
二、杨慎的经籍训诂学与 18 世纪汉学家的歧异		68
三、焦竑:“道”、道德修养、三教合一与语言		73
四、晚明《四书》注解中的训诂学与汉学		79
五、清初的儒家经典研究		81
六、结论		90

清儒的文献研究

全祖望研究的一个侧面——谈全祖望诗文集整理的文献价值

及其所反映的清代学术现象	詹海云	93
一、全祖望的诗文托付杭世骏与董秉纯的过程及原因		94
二、从杭世骏《鲒埼亭集序》的写作时间谈杭、全二人人品 与学术之分歧,并论杭世骏文稿不还全门的原因		100
三、从全祖望诗文稿刊刻经过看董、蒋之异及当时 京师学界对祖望的看法		104
四、从鲒埼亭集评校题识之学者背景分析全祖望 思想与清代学术互动的关系		110